

《钟形罩》中的二元对立解构

刘雨佳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西尔维娅·普拉斯一生中不断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困惑。在其半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 普拉斯以个人真实经历为蓝本, 讲述了女大学生埃斯特·格林伍德在即将步入社会之时面对父权社会带来的重重压力而不断反抗及适应的过程。与德里达的观念相似, 小说多次解构二元对立, 反对所谓的“终极意义”, 凸显文本及世界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父女关系、男女关系、生死关系三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 普拉斯对传统的女性形象提出挑战, 意识到只有挣脱传统观念的枷锁, 埃斯特的人生才能得到救赎, 广大美国女性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关键词

西尔维娅·普拉斯, 《钟形罩》, 二元对立,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 Bell Jar*

Yujia Li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15,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Sylvia Plath was throughout her life troubled by a binary oppositional mindset that allowed for no middle ground. In her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The Bell Jar*, Plath draws on her own experiences to depict the struggles of Esther Greenwood, a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 who, on the brink of adulthood, both resists and adapts to the patriarchal pressures surrounding her. Echoing Derrida's ideas, Plath repeatedly deconstructs binary oppositions in the novel, rejecting any notion of "ultimate meaning" and foregrounding the indeterminacy of both text and world. By unravel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s of father-daughter, male-female, and life-death, she challenges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womanhood and suggests that only by breaking free from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can Esther, and, by extension, American women at large, achieve genuine redemption.

Keywords

Sylvia Plath, *The Bell Jar*, Binary Oppositions, D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钟形罩》(*The Bell Jar*)是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所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小说改编自普拉斯的真实经历,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讲述女大学生埃斯特·格林伍德凭借才华获得纽约一家时尚杂志的实习机会,希望能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但这段“光鲜”的经历却让她深感疏离与幻灭。返回家乡后,她因未被写作班录取而更加郁郁寡欢。不幸的是,家人不理解她的抱负,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使她厌烦无比。埃斯特逐渐陷入更深的抑郁,多次尝试自杀未遂后被送入精神病院。书名“钟形罩”象征着那种将人隔绝于世、令人窒息的精神困境。《钟形罩》堪称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文学先声。小说通过埃斯特·格林伍德的经历,深刻批判了上世纪美国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命运脚本,即在婚姻与母职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单一叙事。埃斯特对双重性标准的愤怒、对贞洁神话的质疑,以及对职业女性困境的清醒洞察,都体现了对性别规范的系统性质询。小说以“钟形罩”这一核心隐喻,精准捕捉了女性在男性凝视下被孤立、被客体化的窒息体验。作为半自传体小说,女主人公埃斯特·格林伍德的家庭情况、社会经历与普拉斯完全一致,同样受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所惑,导致身份认同困难重重,走上自杀之路。但在小说结尾,自杀失败的埃斯特并未和普拉斯一样再次尝试自毁,而是走出精神病院,回归校园与社会。小说通过对几组核心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试图为埃斯特开辟一条超越二元逻辑的精神出路。

当前学界针对《钟形罩》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国内研究主要聚焦女性成长角度,探讨埃斯特的成长环境及榜样缺失问题对其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郭淑青指出,埃斯特从小承受着“屋中天使”带来的压力,被禁锢在女性的世界里,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她只知道如何成长为一个“女人”,而非“成人”[1];陶晶认为,埃斯特既希望自己日后事业有成,又不愿完全脱离传统女性价值观而被视为“异类”,导致其心理压力日益加重,但家庭与外界都找不到合适的“引路人”,因此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2]。

国外学界近二十年的研究则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理论视角。在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领域,伊丽莎白·唐纳森将《钟形罩》置于“精神病院小说”的传统中加以考察,探讨女性主体如何在精神病学话语与父权规范的双重规训下被构建为“疯癫”[3]。梅尔维·乌查克在其博士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婚姻和家庭以不同时代但相似的方式消解女性主体性,而精神病学则充当了社会规范的代理人,将女性的反抗病理化为“疯狂”[4]。近年兴起的医学人文学视角则挑战了将埃斯特的崩溃纯粹解读为临床抑郁症的做法:皮尤什·普什卡尔批评了以DSM诊断标准框定《钟形罩》的倾向,主张关注小说所揭示的父权制作为结构性压迫力量如何将女性的个人抱负与社会角色期待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精神危机[5]。这一立场与西蒙娜·波罗从怪诞美学角度对小说的解读形成呼应,她借凯赛尔与巴赫金的理论框架,论证普拉斯如何通过将熟悉之物陌生化的美学策略,揭示战后美国对女性气质、正常与进步的意识形态承诺背后的暴力和扭曲[6]。

此外，部分学者将德里达的幽灵学与《钟形罩》的文本分析相结合：莎拉·布尔温克尔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德里达的“踪迹”与“幽灵”概念，探讨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限定如何在埃斯特的生命中留下幽灵，不断萦绕于她的身体与意识[7]。

然而，以上研究虽从不同角度触及了《钟形罩》中的二元对立问题，却存在两个共同的缺憾。其一，多数研究将精神崩溃、性别规训与身份困境视为可被女性主义或医学人文等单一框架所解释的现象，未能充分关注小说文本自身如何解构了这些二元范畴本身。其二，即使部分学者已尝试引入德里达的概念，但幽灵学往往被用来描述一种“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而非德里达更为根本的关注点：意义如何在语言自身的差异与延迟运动中被不断延异。换言之，现有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内容层面对二元对立的揭示或批判，而缺乏对小说语言如何从内部解构这些二元对立的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以德里达的“延异”与“踪迹”概念为核心工具，将分析从人物形象与社会语境推进至小说语言的隐喻网络、能指滑动和叙事结构层面，论证小说文本本身如何通过语言运动使父女、男女与生死三组二元对立的边界变得不可维系。

2. 对父女关系二元对立的解构

埃斯特的父亲在她九岁时因病去世，父职的缺失导致《钟形罩》中的父女关系不似传统精神分析批评提出的俄狄浦斯论，而是蕴含着埃斯特因爱生恨、错综复杂的情感。小说通过解构埃斯特与父亲不同寻常的父女关系，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观念，也反映了埃斯特身份认同之感。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提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爱恋对象，在女孩不再依恋母亲之后，她们会逐步转向父亲的怀抱[8]。小说中，埃斯特幼年时与父亲关系十分密切。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在她身上花费了很多心血，教她读书写字，带她在海滩上奔跑，更直言她是他最爱的孩子。拉康进一步提出，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结构是组成稳定家庭的关键因素，即使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去世了，他在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依然存在，并且由能代替父亲作用的能指来占据这一空间，这个能指应该是能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的[9]。父亲去世后，埃斯特尝试学习父亲的母语德语，读父亲留下的书籍，把父亲留下金属落地灯搬到她的书桌旁。德语、书籍、落地灯就充当了能体现父亲象征力量的“父亲之名”，也在无意识中满足了女儿对父亲的俄狄浦斯式爱恋。

父亲的去世使家庭稳定三角关系遭到破坏，但父亲留下的空缺可以由他人或物品来填补。已过世的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可以通过母亲的话语来体现，如果母亲认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使他已经不在人世，他对孩子们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母亲的话语存在，他在三角结构中的位置也存在[9]。从埃斯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曾多次提到过他。母亲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一个不信任人寿保险的无神论者，向孩子们回忆蜜月时父亲对她说的话，让孩子们不要为父亲的死亡悲伤等等。母亲的话语也是父亲名字的能指，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作用得到了母亲的确认，也就还存在于家庭三角结构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埃斯特与父亲符合精神分析理论认定的父女关系。然而，处于家庭背景和社会时代等多重特殊性，父亲的去世为整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埃斯特对父亲不只有俄狄浦斯式的爱恋，更多的是父职缺失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带来的恨意。首先，普拉斯作为诗人，十分善用意象和隐喻，从主角名字就能看出。女主角的名字“埃斯特”(Esther，又译作“以斯帖”)与拯救了波斯犹太人的古波斯王后同名，而埃斯特的父亲却是德裔美国人。这一命名在历史语境中，不免让人联想到一种将父女关系类比为历史极端对立的象征可能。普拉斯在诗歌《爹爹》中曾使用过类似的修辞策略，苏珊·范·戴恩在分析该诗时指出，诗中攻击性“不仅指向标题中的父权人物，更指向那种首先由父亲践行、后来由吸血鬼般的丈夫再生产出来的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但她同时强调，这种语言冲动是“多重原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其极端性并非指向一个确定的意义，而是一种“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uncensored excess)[10]。

其次，孩子会在无意识中将父亲与能代表父亲身份的物体相联系，这样做能提醒孩子父亲之名在家庭三角结构中仍然存在[9]，但缺失背后隐藏着因年幼失去父爱带来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的治愈，很容易由爱生恨。埃斯特尝试学习德语，但是她一翻开词典，脑子“就像蛤蚧一样闭上了”[11]；她努力学父亲擅长的物理，尽管在学期结束拿了优，但实际上这门课程让她感到无比恶心；在把父亲留下的落地灯从母亲床边搬到自己的书桌旁时，她被电击得差点灵魂出窍。从德里达的视角看，遗物是父亲永久缺席后留下的“踪迹”。父亲从未真正存在于小说的叙述时空中，然而，正是这个永不在场的人，其踪迹遍布全书：德语词典、物理课本、金属落地灯、墓园的石碑，每一个踪迹都指向那个缺席的源头，却又没有一个能完整地“再现”他。父亲的意义恰恰产生于这些踪迹之间的差异运动，艾斯特每一次试图接近父亲都不仅没有抵达，反而再次延异了父亲的意义。埃斯特努力寻找父女关系的纽带，但一次次失败让她开始怨恨父亲过早离世。在稳定的家庭三角结构中，母亲应该作为联系孩子和去世父亲的纽带而存在，埃斯特的母亲虽然会向孩子提到父亲，但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也具有复杂性。埃斯特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母亲是她父亲的学生，他们在大学相识相恋后成婚，婚后母亲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照料丈夫和一儿一女。埃斯特说，从妈妈和爸爸去度蜜月的那天起，妈妈的日子就再也没舒心过。她怨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给她自由，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存款。所以即使丈夫离去，她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来养活两个孩子。

母亲每每提及父亲，语言间的抱怨多过温情，无法弥合父职缺失在埃斯特内心刻下的精神裂痕。正是在这一裂隙中，埃斯特对父亲的恨意开始悄然蔓延。她多次忆及父亲去世后家中捉襟见肘的生活，言语间暗含对父亲未尽家庭责任的责备；母亲原本学识渊博，是大学里的佼佼者，如今却沦为庸常世故的中年妇女，埃斯特将这一变化归咎于父亲。更为耐人寻味的是，父亲已离世十余年，她才恍然意识到自己从未去扫过墓，也未曾为他痛哭。这并非遗忘，而是潜意识里她并不真正为父亲的死感到悲伤。正是这种对父亲既爱且恨的纠结情感，使埃斯特自幼便感到自己与家庭、与社会的主流观念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父女关系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并未被完全地消解，而是呈现为一种持续张力的状态：埃斯特既无法彻底否定父亲，也无法完全原谅他的缺席，无限接近于德里达所谓的“延异”状态。步入青春期后，当两性关系的启蒙如期而至，家庭正面引导的缺失与社会规训的双重压力再次将她推入身份认同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恰恰为她日后在性别秩序中的反抗埋下了伏笔：“父亲”所象征的父权权威在其心中已无法稳固立足，男性形象便失去了传统的神圣光环。由此便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解构：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

3. 对男性与女性形象二元对立的解构

如果说父亲早逝带来的爱恨纠缠，让埃斯特在原生家庭中率先体认到父权权威的裂隙，那么当她的目光从家庭转向社会、从父女关系转向两性秩序时，这道裂隙便开始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蔓延与崩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早已揭示，西方形而上学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并非天经地义，而是一种可以被拆解、被翻转的语言等级秩序。《钟形罩》以冷峻而敏锐的笔触回应了这一解构实践：作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颠倒男女地位，而是通过彻底颠覆传统的男性形象、同时重塑被压抑的女性形象，使“男性/女性”这对看似稳固的二元结构失去了赖以成立的根基。于是，父亲所象征的权威在家庭中的松动，最终演化为整个性别秩序在小说中的动摇。

当时的美国社会，男性被期待呈现阳刚之气，女性则被要求保持温柔。二十世纪早期的硬汉文学中，年轻男子往往通过展露性魅力与主导权来获取女性芳心，而女性也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性别脚本，心甘情愿地充当性关系中弱势、被动的一方。《钟形罩》却背离了这一文学传统，塑造了一系列迥然不同的男性形象：懦弱，乏味，缺乏性魅力，甚至在亲密关系中佯装弱势。小说通过这种书写，瓦解了生理性别

所规定的男女气质，从而解构了性别二元对立。

埃斯特与巴迪和康斯坦丁的交往，既是她不断自我怀疑的过程，也是她逐渐认清社会真相、找回自我判断的过程。埃斯特的第一任男友巴迪·威拉德被她直斥为“一个可憎的伪君子”[11]。作为一名医学生，巴迪就读于一所全男生的学院，却“既不抽烟又不喝酒”；在与埃斯特的交往中，他从未展现过男性阳刚的一面，为女友买杜博内酒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个学医之人也有品味，更从不在女友面前谈论性，反而“装出一副我风骚而他纯洁的样子”[11]。更耐人寻味的是，巴迪去疗养院看肺结核、与埃斯特交往乃至求婚，全程都由巴迪的母亲一手操控，彻底背离了传统男性自主择偶的模式。面对巴迪懦弱虚伪的面目，埃斯特最终毅然离开，未为甜言蜜语所动；而另一个女孩琼之所以接受巴迪，也并非为其男子气概所吸引，只因巴迪的父母对她友善。这种对男性的祛魅书写，颠覆了硬汉文学中的男性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巴迪的“祛魅”并非通过一个确定的结论来完成，而是通过叙事者对巴迪的不断重新描述来实现的。巴迪每一次出现在叙事中，其意义都在不断变化，“巴迪”作为一个能指，其所指在不断滑动：从理想男友到“伪君子”到主体缺席的空心人，每一次描述都没能回答出“巴迪到底是谁”的最终答案。在德里达的观念里，巴迪这个人物的意义并不在于某种本质，而在于这些描述之间的差异关系。埃斯特最终离开巴迪，不是因为看清了某个确定的真相，而是因为巴迪的能指链条已经延异到了无法再被固定为值得爱的对象的程度。

在刻画埃斯特的第二任男友康斯坦丁时，小说则进一步消解了男性的主导权。康斯坦丁曾是巴迪家的房客，与埃斯特的见面同样由巴迪的母亲安排；而这一次，占据主动权的却是埃斯特。一起参观联合国、共进晚餐、夜晚回到康斯坦丁家中乃至留宿，表面上是康斯坦丁逐一提出，实则是在埃斯特的层层暗示下，康斯坦丁才被动完成了这些邀请。然而，康斯坦丁虽带埃斯特回家，却丝毫没有在初次见面便“勾引”她的意图——这与传统男性主导亲密关系的模式截然不同。埃斯特察觉后，于凌晨三点主动告辞。巴迪的懦弱与康斯坦丁的迟钝，恰好构成小说中男性人格的两面镜像：前者以虚假的道德伪装掩盖内在空洞，后者以被动的不作为回避主体责任。巴迪的困境是“过度扮演”，他试图符合规范却始终暴露表演性质；康斯坦丁的困境是“扮演不足”，他拒绝主动承担责任却反而背离了规范本身。在这两种相反的轨迹中，“男性气质”既无法在巴迪身上被稳定执行，也无法在康斯坦丁身上找到替代形式，使埃斯特始终无法提取出一个确定的“男性本质”作为参照。因此，小说对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不是通过提供“另一种男人”来完成的，而是让“男人”这个能指本身失去确定所指。

与这两个非典型男性的交往让埃斯特经历了深刻而痛苦的自我怀疑。巴迪的伪装使她一度责备自己太过风流、不够洁身自好；康斯坦丁的疏远又令她怀疑自己缺乏性魅力，不足以吸引男性。然而，纽约之行使埃斯特最终看清：父权社会中的男性虽坐享制度性红利，大多数实则内心空无一物；而女性虽大有可为，成就事业的前提恰恰是勇敢背弃传统婚恋家庭观的束缚。小说通过塑造巴迪和康斯坦丁，不仅削弱了男性主体地位，更揭示了性别规范对两性精神的共同压制——男性被禁锢在“阳刚”面具之下同样不得自由。

女性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中仍然处于客体地位，未婚女性受社会对女性气质的约束，在学校和职场都被区别对待；而结婚之后，女性是丈夫的附属品，丈夫有权决定妻子能否学习、能否工作，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只有相夫教子、照顾家庭。这些刻板印象根深蒂固，甚至女性自己都难以察觉。然而，《钟形罩》塑造的主要女性角色都不受传统的约束，努力逃出父权社会的枷锁，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埃斯特在纽约杂志社实习时的老板杰·西“是个有头脑的人”[11]，对自己和手下员工都要求严格，她不化妆、不贴假睫毛、不戴首饰，以这种方式对抗社会引起的女性外貌焦虑；她本人是个工作狂，杂志名叫《淑女时代》，她用女性杂志与行业里的男性对抗；她招的实习生全是女孩，对她们要求严格，却

不吝惜提供建议。埃斯特的同乡、曾与巴迪交往过的琼在大学里是个红人，长相标致，是班长，还是曲棍球冠军，被很多男生追捧，但因为在做暑假工时被无理取闹的男性上司多次骚扰，导致精神崩溃，对社会彻底失望，宁愿用进入精神病院的方式逃脱这一切。小说主人公埃斯特自己也一直走在反抗的道路上，她不服气物理老师说女孩学不好这门课，尽管确实不擅长物理，但她宁愿花十倍的功夫，也要在期末测试得到“优”；她对母亲让她去当速记员一事嗤之以鼻——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而母亲认为速记员是最适合她的职业，只是希望她在与巴迪结婚后能多花些时间照顾丈夫和孩子；周围的人都提醒她巴迪是一个多么好的伴侣，暗示她应该见好就收，早日安顿下来，但在意识到巴迪的真面目之后她勇敢地拒绝了巴迪的求婚，并告诉他“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11]。杰·西的去女性化、琼的崩溃、埃斯特的不婚，各自生产着互不相同的“女性”含义。这一差异网络使“女性”这一能指失去了被单一所指固定的可能性，它不再等同于“温柔”或“顺从”，但也并未完全被替换为“强硬”或“独立”，而是在三者之间的滑动中不断延异。

通过颠覆男性形象与重塑女性形象，《钟形罩》消解了“男性/女性”这一看似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她笔下的男性不再是阳刚、主导、值得依赖的权威象征，女性也不再是温柔、被动、甘居客体的附属存在。当埃斯特在一次次交往与反抗中认清以男性为主导的秩序的空洞本质，她所获得的并非单纯的性别胜利，而是一种更深刻的觉醒：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不过是社会建构的幻象，真正的束缚从未来自某一性别，而来自二元对立思维本身。但文本并未给出这一觉醒之后的明确路径，埃斯特“永远不结婚”的宣言构成了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当两性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之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什么？小说对此保持了沉默，由此，埃斯特在现实的两性关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精神的重压便将她推向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对立——生与死。如果说男女对立的解构让埃斯特看清了社会如何规训身体，那么生死对立的解构则将追问的触角伸向了存在本身：当“活着”意味着不断承受失望、虚伪与窒息感，“死亡”是否反而成为一种诱人的解脱？小说中埃斯特反复出现的自杀意念、对死亡的浪漫化想象，以及最终那悬而未决的“重生”，共同构成了对生死二元对立的深刻解构——而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将要展开的分析。

4. 对生与死二元对立的解构

性别困境之所以难以超越，根本原因在于它只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身体与身份层面的一个投影。从柏拉图以降的灵魂/肉体对立，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分，再到萨特将死亡视为生命意义的否定者，西方思想传统始终将“生”与“死”安置于等级分明的两极：生是积极、本真、值得追求的，死是消极、异化、应予回避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恰恰要打破这种封闭的等级秩序，揭示对立项之间的相互依存与渗透。《钟形罩》以一种近乎现象学的方式实践了这一理论：她并未将死亡简单地书写为生命的对立面或终结者，而是通过埃斯特被异化的生存体验、与死亡之间暧昧纠缠的联系，以及诉诸死亡所达成的隐秘沟通，赋予了死亡以超越“生命否定者”的复杂意涵。

小说解构生死二元对立的方式之一是异化女主人公埃斯特的生存。埃斯特身份认同困难重重，她一直试图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却一直以失败告终。尝试自杀之前，埃斯特一直在双重身份之间摇摆：在学校里，她是成绩优异、博学多才的“格林伍德小姐”，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学生；但一回到家中，她便丧失了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她是“女儿埃斯特”，是妈妈没有生存技能、找不到工作的女儿，是巴迪的女朋友，是威拉德太太想要的儿媳妇。埃斯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诗人，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这意味着她需要在学界抛头露面，不会像传统女性一样相夫教子。但家庭与周围环境的影响使她无法完全与传统性别观念割裂，勤俭持家的祖母、母亲和威拉德太太；美丽优雅，有十足“女人味”的多琳；务实体贴，精通厨艺的乔蒂等传统意义上“成功的”女性时刻在提醒不会做饭、不会速记、不爱打扮的埃斯特

作为一个女人有多么失败，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与她价值观相符的模范形象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埃斯特在纽约的杂志社找到了一个可以被当作模范榜样的人——杂志老板杰·西，但她强硬的沟通方式让埃斯特无所适从。缺乏可靠的倾诉对象，埃斯特的生存逐渐被边缘化，她不断否定自我，在传统道德观念和个人精神追求之间苦苦挣扎。

透过埃斯特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的经历，小说试图阐明女性被压制的自我意识对其身份认同所造成的困境。有觉醒意识的女性少之又少，她们是破碎的、割裂的、被异化的，既无法说服自己，又无法对其他女性产生正向影响。

《钟形罩》解构生死二元对立的第二个手段是展示生者与死亡的联系。艾斯特与死亡之间的联系并非一次性建立，而是通过一个死亡意象不断延异的链条逐步展开的。小说中，卢森堡夫妇让埃斯特第一次将自己与死亡联系起来。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丈夫在第一次通电之后就死去了，而妻子却没有立即死亡，又通了两次电才正式宣布死刑结束——她遭受了三次惨绝人寰的折磨才最终走向死亡。小说一开始就描绘了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这件事给埃斯特带来的心灵震撼，这事和她毫无关系，但那个夏天埃斯特“老是从电台广播和办公室闲话里听到关于卢森堡夫妇的消息，以至到后来我简直没法不想着他们”[11]，“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活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5]。回家之后，埃斯特的母亲带她去看的精神科医生戈登大夫对埃斯特使用了休克疗法——以一定量的电流通过患者头部，导致患者浑身抽搐，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电流穿过身体的痛苦让埃斯特难以承受，再加上有卢森堡夫妇的经历在前，她认为电击不是治疗，而是对坏人的惩罚。“我想那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11]。

卢森堡夫人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她起初是一名有抱负的演员和歌手，她无暇顾及自己的两个儿子，而是疯狂投身事业。埃斯特与卢森堡夫人有不少共同之处，那个夏天埃斯特获得了在纽约的杂志社见习的机会，不仅符合她的职业规划，也是她逃脱家庭、逃脱小镇、逃脱周围陈腐思想的手段。卢森堡夫人勇敢地背弃母职和传统的妇女形象，有自己的追求，最终却落得电击而死的下场；虽然埃斯特认为电击是可怕的极刑，但当时的美国社会普遍觉得卢森堡夫人罪有应得，和埃斯特一起在杂志社实习的女生希尔达说“让这种人活着实在太可怕了，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11]。周围人极端的评价让本就无法坚定挣脱枷锁的埃斯特更加恐惧，她怕自己和卢森堡夫人遭受同样的痛苦，后来经历的休克疗法让她更加坚定自己会因为反抗“社会规范”受到惩罚。她不愿如此痛苦地死去，因此在听说戈登大夫还要给她进行数次休克疗法之后，她选择自行结束生命。埃斯特接受与电刑类似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是埃斯特与卢森堡夫人产生联系的手段，休克疗法之前埃斯特只是怀疑她会因反抗而死，但体验过休克疗法之后她坚定了死亡的心理。

但埃斯特的自杀尝试并不顺利，她试过割腕、上吊、溺水，但这几种死法反而激起了她对人世间的留恋。这时，埃斯特第二次与死亡建立联系，坚定了她自杀的心理。埃斯特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死者形象是她的父亲。父亲是她生命中第一个死者，为了不让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褪色，埃斯特在父亲死后，曾经努力寻找连接她与父亲的纽带。她学习父亲的母语德语，读父亲留下的书籍，把父亲留下的金属落地灯搬到她的书桌旁。在她最后一次尝试自杀之前，她去了父亲的墓园，趴在他的墓碑上放声痛哭。这时她明白了，死在截肢手术的手术台上对父亲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父亲强烈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得了作为一个残废苟活下来，于是死亡带走了他。这次与父亲的“对话”使埃斯特终于找到了自我，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做出了选择，生死并非完全对立，死不是凌驾于生命之上的，生也无法为人带来美好。

艾斯特与死亡之间的关联并非一次性建立，也非指向某个单一的源头。卢森堡夫人的电刑、戈登大夫的休克疗法、父亲的截肢手术与墓园、艾斯特自己的多次自杀尝试，这些死亡事件在叙事中并非孤立地排列，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似性相互缠绕，形成一个不断延异的踪迹网络。每一次新的死亡意象的出现，

都不是对前一次的简单重复，而是重新书写了此前所有死亡意象的意义。卢森堡夫人的死本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当艾斯特将它与自己的休克疗法并置时，它的意义被延异为女性因反抗规训而受罚的寓言；而当休克疗法与父亲的截肢手术并置时，二者的意义又被重新配置为医学权力对主体性的侵犯；最后，当所有这些意象与艾斯特自己的自杀并置时，死亡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定义的对象，而成为一条永无止境的差异链条。每一个死亡都指向另一个死亡，每一个死亡的意义都在与其他死亡的差异关系中被不断推迟和重塑。

这正是德里达所说的“踪迹”的运作方式。死亡从未在《钟形罩》中作为“一个确定的事件”完全在场。父亲的死亡发生在小说叙事开启之前，卢森堡夫人的死亡发生在埃斯特的遥远感知之中，休克疗法是模拟死亡而非死亡本身，而埃斯特的多次自杀全部失败。死亡始终是“缺席”的，它从未真正降临于艾斯特，却通过卢森堡夫人的电椅、戈登大夫的仪器、父亲的坟墓等一系列踪迹反复在场。每一次死亡意象的出现，都携带着此前所有死亡意象的残余，同时又向未来的死亡意象敞开；意义在这个踪迹网络中不断迁移，永远无法被固定在某一个死亡事件之上。所有这些死亡意象叠加在一起，使艾斯特最终无法将死亡理解为生命的单纯否定。死亡在她的经验中是一个不断延异的能指：它既是惩罚也是解脱，既是终结也是沟通，既是恐惧的对象也是执念的源头。正因如此，当艾斯特大胆承认死亡“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地貌”^[11]时，她并非在为一个确定的概念下定义，而是在承认死亡的意义已经在她内部延异到了一个无法被任何单一的二元对立所收束的地步。生死之间的二元界限，正是在这个延异的过程中被语言本身消解了。

埃斯特曾经认为，她的小说不被写作训练班认同的原因是她缺乏人生经验。“我从未体验过爱情、养过孩子，甚至从未目睹过死亡，怎么能描写人生呢？”^[11]于是，从墓园回家后，埃斯特吞下了几十颗安眠药，第四次尝试自杀。然而埃斯特并未得偿所愿。如果埃斯特就此死去而没有之后的故事，那么只能说明人生是一条单向道路，死亡是终点，死亡与生命的对立依旧存在。但为了打破生死的二元对立，《钟形罩》将人生写作一个闭环，死是生的一部分。死亡的完成使人生获得了整体性，经历过死亡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埃斯特毫不避讳谈及这段经历，也不在意巴迪讽刺的“我真纳闷现在谁还会娶你”^[11]。而自杀未遂则为她提供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小说结尾，埃斯特即将重回学院，回到以往的生活，而内心却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感到激动万分，就像见到树林和草原淹没在齐腰深的洪水中——仿佛世界原有的秩序有了些微的变化，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1]。然而，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艾斯特已经抵达了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终极状态。埃斯特走出精神病院，但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文本最终留给读者的，不是生死二元对立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悬置的状态：艾斯特既非生者的单纯代表，也非死者的代言人，她横跨在两者之间，但这种横跨本身是暧昧的、未完成的、永远在延异中的。生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但一个新的确定位置并未建立。

5. 结语

本文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理论框架，分析了《钟形罩》中三重二元对立的消解策略。首先，在父女关系层面，通过描写埃斯特对父亲既依恋又怨恨的矛盾心理，以及对理想父权权威的幻灭，解构了传统精神分析框架下“父亲/女儿”作为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等级秩序，揭示了父权象征在个人情感层面的空洞与虚妄。其次，在两性关系层面，小说通过塑造懦弱无能的巴迪与迟钝乏味的康斯坦丁，瓦解了硬汉文学传统赋予男性的阳刚神话，同时呈现了埃斯特、杰·西与琼等女性在反抗中的有限性与困境，从而揭示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作为社会建构的虚构本质。最后，在生死关系层面，当埃斯特在两性关系中无处立足，精神重压将她推向生与死的终极追问。小说并未将死亡书写为生命的单纯否定，而是赋予其沟通、重生与存在反思的复杂意涵，从而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生/死”的等级秩序。三重解

构层层递进，从血缘伦理到社会角色再到存在本身，共同构成了一种文本效果：小说似乎在暗示，真正的束缚并非来自某一具体的压迫者，而更可能来自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埃斯特最终的“走出去”并非传统成长小说中的圆满结局，而是一种更为暧昧也更为真实的状态——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已不再接受任何现成的二元答案。

参考文献

- [1] 郭淑青. 独特的女性成长模式——解读《钟形罩》[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7(1): 50-52.
- [2] 陶晶. 《钟形罩》——一部“榜样缺失”的女性成长史[J]. 社科纵横, 2006(4): 153-155.
- [3] Donaldson, E.J. (2022) Psychiatric Disability and Asylum Fiction: From *The Snake Pit* to *the Bell Jar*. In: Helle, A., Golden, A. and O'Brien, M., Eds., *The Bloomsbury Handbook of Sylvia Plath*, Bloomsbury Acedamy, 43-52. <https://doi.org/10.5040/9781350119253.ch-3>
- [4] Uçak, M. (2022) Treatment of Feminine Madness as an Apparatus to Train the Other in Sylvia Plath's *The Bell Jar* and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 Ph. D. Thesis,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 [5] Pushkar, P. (2025) *The Bell Jar*: Allow the Humanities to Humanize. *BJPsych Advances*, **31**, 189-191. <https://doi.org/10.1192/bja.2024.73>
- [6] Porro, S. (2025) Estranged Bodies, Alienated Minds: Grotesque Aesthetics and Resistance in Sylvia Plath's *The Bell J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8**, 1-6. <https://doi.org/10.32996/ijllt.2025.8.11.1>
- [7] Bullwinkel, S. (2023) Haunting the Female Body: The Female Body as the Site of Socio-Cultural Inscription and Its Hauntological Afterlife.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 [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导论[M]. 张艳华,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9] 雅克·拉康. 父亲的姓名[M]. 黄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0] Van Dyne, S.R. (1994) *Revising Life: Sylvia Plath's Ariel Poems*.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1] 西尔维娅·普拉斯. 钟形罩[M]. 杨靖,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